

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基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分析*

谢 超◎

【内容提要】 对于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恶化原因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2001年以来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和两国关系定量衡量曲线,发现中日实力对比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走势,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日本政府挑起的冲突的对抗程度越大、频率越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挫折—攻击理论出发,根据中日关系的事实和数据,分析了与中国崛起过程相伴随的日本的挫折量积累过程,论证了正是日本主动采取改变现状的政策,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发出挑战,引发两国的冲突和对抗,导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本文以钓鱼岛问题为例,对2001年以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赋值分析,证明了在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下中方的保持现状政策由于日本的主动挑衅而逐渐失去效用,导致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定量衡量 实力对比 挫折—攻击理论 钓鱼岛问题

* 本研究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支持。本研究从阎学通老师、刘江永老师和孙学峰老师开设的有关研究生课程讨论获益良多,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阎学通老师的悉心指导,漆海霞老师慷慨协助提供大国关系定量衡量数据,笔者在此深表感谢。感谢曹玮、曹金绪、周建仁、周晓加、杨原、胡若愚等同学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总第35期),第62—8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 导言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进程中,钓鱼岛问题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中方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下文简称“搁置争议政策”),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扫清了障碍。^①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时有争议和摩擦,但总体上没有影响中日经济合作的大局。搁置争议政策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中国处理领土与领海争议问题的指导性政策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和领海争议,取得了比较好的政策效果,中国没有因为领土争议与邻国发生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进入 2012 年,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不断。^②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公开否认钓鱼岛问题存在领土争议,搁置争议政策遭受严峻挑战。日本政府的举措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中国国内也出

① 1972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的邀请访华。9 月 29 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根据声明,两国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根据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徐敦信作为亲历者所做的记录,在 9 月 27 日周恩来会见田中角荣首相时,后者主动提出想听取中方对钓鱼岛问题的见解,周恩来总理明确跟他讲,这次不想谈这个问题,谈了没有好处。周总理的意思是,这次谈钓鱼岛问题虽然没有结果,但不能因此影响两国之间大问题的解决。田中角荣听明白了,也表示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以后再说。田中讲,他相信邦交正常化以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历史事实,从那时起,中日两国搁置争议。参见刘江永《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日本学刊》2012 年第 6 期,第 6 页。

② 2012 年 1 月,日本政府以将作为日本专属经济区基点的 39 座离岛命名为由,将钓鱼岛群岛内的四座小岛礁夹带其中,以显示日本对钓鱼岛群岛的“主权”。4 月 16 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访美演讲中表示,东京都要通过向“尖阁诸岛”(即日本在窃取我钓鱼岛群岛后起的日本名)的所有权人购买的方式实现其公有化,以“保卫尖阁诸岛”。7 月 7 日,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当天,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说,日本政府将计划购买钓鱼岛。9 月 11 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最终通过了从 2012 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 20.5 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日本政府对钓鱼岛所谓的“国有化”正式宣告成立。有关信息可见新浪网中日钓鱼岛问题专题报道, <http://news.sina.com.cn/z/rbgd2012/> (访问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之际,中日关系跌至谷底。^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同样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为什么在改善和稳定中日关系方面,有时效用比较明显,有时不那么明显?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摩擦不断?更进一步说,是什么导致中日关系日益恶化?随着中国日益崛起,特别是在 2010 年中国 GDP (按现价美元计算,除非特别说明,下文指称的 GDP 即指现价美元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甚至进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差时期,其中原因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二 关于中日关系恶化原因的争论

对于中日关系恶化原因的争论,最直接且最容易的回答是中国崛起,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势头十分迅猛,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剧烈波动并持续恶化。^② 但对于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例如 2012 年,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发布一份报告,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是中国。该报告认为,二战以后日本就走和平主义道路,日本关注中国崛起,包括 2010 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一事;由于中国实力上升后在中日岛争等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日本的这种关注才转为担忧,因此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在于中国,中国实力上升后日益强硬的对外外交政策导致双边关系持续恶化。^③ 更有分析指出,

①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于中日关系定量分析的数据表明,当前中日关系值处于自小泉时代以来的最低点,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② 这一解答比较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大框架,特别是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思路。这一理论认为,挑战国不满意自身在现行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强烈希望重新定义国家间关系的规则和规范,以便从这种与其军事实力相称的体系中获益,参见 A. F. K. Organski and Jac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3。摩根索强调权力变化,认为崛起国只要通过增加实力来改变国际权力体系就可以被定义为挑战国,参见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5th ed., p. 46。前者除了强调实力外,还强调意志,即崛起国是否希望通过改变规则来增加自身权力。

③ Charles Grantham,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13 June, 2012. <http://www.cer.org.uk/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12/japans-response-chinas-rise>.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外交政策行为变得不可预料,在中日岛争中中国被视为挑衅方,中日岛争的恶化和升级只会加剧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包括印度、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会更加热衷于寻求美国的支持。^① 归纳起来,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一是中国实力上升,二是中国实力上升后采取强硬外交政策,即中国有实力、有意愿采取挑衅日本的政策,从而导致中日关系恶化。

在分析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时,还有学者走得更远。例如就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上升实际持容忍的态度,并没有采取遏制和围堵政策,“中国威胁论”只出现在少数日本政客的言论中,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并没有把中国崛起看成威胁,作者还进一步强调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利益和国家战略的尊重和合作,才造就了中国如今的崛起;中日之间的纷争从来没有涉及中国的根本利益,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是因为中国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武断主张而造成的。^②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有实力和意愿采取挑衅日本的政策外,日本对华政策一直保持温和,因此作者认为日本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正方,中国是中日关系恶化的源头。

上述两类观点无视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本文在此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例加以反驳。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时,有关“周边事态”的适用范围问题成为最大的焦点。美日两国只是在指针中模糊地表示,“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的(日本周边事态)”,同时承诺,“针对周边海域和为了保护海上航线,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双方承诺采取共同行动”。^③ 对于美日同盟中这个海上航线的适用范围,日本学者浦

① “The Drums of War: Armed Clashes over Trivial Specks in the East China Sea Loom Closer,” *The Economist*, January 19,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569757-armed-clashes-over-trivial-specks-east-china-sea-loom-closer-drums-war>.

② BjörnJerdén and Linus Hagström, “Rethinking Japan’s China Policy: Japan as an Accommodator in the Rise of China, 1978 – 2011,”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2, 2012, pp. 215 – 250.

③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朝日新闻》1997年9月24日。见中华网对该指针的全文翻译, http://news.china.com/zh_cn/focus/usa-japan/11026864/20050221/12119617.html (访问时间:2012年12月15日)。

野起央研究后指出,由此派生的可能性将“适用于中国周边地区以致台湾周边地区的问题”。^①日本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战略不言自明,至于日本对华政策是否充满挑衅,无论是小泉时代炒作教科书事件和参拜靖国神社,乃至后期右翼分子押注钓鱼岛问题挑战中国,及至野田内阁最终在钓鱼岛问题上迈出“国有化”的危险步骤,无不可以看出一个蠢蠢欲动的日本,在中日关系系列问题上主动挑起争端,意图制衡和挑战中国。

相对以上观点,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从最初的接触政策开始,在中国崛起并最终超越日本以后,日本对华政策演变为削弱、压制乃至遏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②不过类似解释仍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即因为中国实力快速上升,导致东亚地区格局下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上升,使日本感受到中国挑战现有东亚格局的威胁,从而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这一解释,包括前文提到的解释并不充分。首先,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是一个挑战现状国家。^③其次,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长期执行搁置争议政策,搁置争议的政策选择本身就说明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维持现状的战略。相反,日本在对待中日关系尤其是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更像一个挑战现状国家。实际上,在中国开始真正意义的崛起之前,日本方面就在钓鱼岛问题上小动作不断,两国关系因钓鱼岛问题也多次出现震荡;随着中国崛起势头日益明显,面对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的现实,日本的战略选择是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上升地位,在争议问题上选择强硬立场,力图改变争议问题现状。

① 浦野起央 《日美安保同盟与日中关系》,张植荣译 《国际论坛》1995 年第 5 期,第 74—75 页。

②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2009, pp. 837 – 856.

③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现状不满,但并没有提出如何衡量崛起国所谓“不满”的标准。通过对比挑战现状国和现状国领导人出访模式的不同,有学者对中国领导人出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中国更符合现状国家模式。参见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 – 177.

笔者认为，实力对比的变化在中日关系中的确扮演了基础性的作用，但这样的答案未能解释的问题是：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如何在中日关系的起落中发挥作用的？因为在中日实力未扭转之前，或者说在未达到扭转的临界点之前，中日关系也起落不定，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上纷争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时有摩擦。诚然，以实力对比变化来解释中日关系比较符合我们日常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但这个解释过于抽象，概括性太强，可以用来解释中日关系的一切现象，但却未能提供充足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特别是在这种实力变化正在进行且未达到质变的临界点时，对于实力对比变化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需要更详尽的解释。

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 2001 年以来中日实力差距缩小乃至中国超越日本后，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日本还是中国主动挑衅？随着中国实力反超日本并不断扩大对日本的优势，当前现实迫切需要学界就实力对比在中日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探求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找出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日本在面临中国快速崛起的压力时，在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问题上采取挑衅政策更多的是自身的主动选择，对于搁置争议政策下的钓鱼岛问题，日本选择的是挑战现状政策。

心理学的挫折—攻击理论有助于解释以上问题。耶鲁大学的约翰·多拉德教授提出了该理论早期的核心思想，认为攻击总是挫折的结果，即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前提，而且挫折的存在总是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① 这一发现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因为挫折导致攻击的经验，但生活中的实例也证明，并非所有受挫都会产生攻击，挫折并不是引发个体攻击性的唯一原因。因此伯科威茨对早期挫折—攻击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挫折并不直接导致攻击，而是为攻击的产生提供了情绪的唤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 255 页。

醒和准备。^① 真正的攻击要发生需要挫折的不断累积, 攻击所需的最小挫折量取决于欲望受到阻碍的程度。^②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当外界给予不愉快的刺激增强时, 个体为了摆脱不愉快刺激带来的负面情绪, 攻击性会增强。而当这种刺激达到一定的强度使得个体无法承受时, 其攻击性反而会降低, 原因是个体的目的在于逃离这种高强度的不愉快刺激。也就是说, 攻击性并不总会随着挫折的增强而不断增强, 攻击的强度与挫折的强度之间有着类似倒 U 型的关系。^③ 根据上述理论的启示, 结合笔者观察到的中日关系事实现象, 在论证中日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之间的变化和互动过程时,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导致日本采取挑衅中国的政策或行为;

研究假设二: 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 日本挑衅行为的强度越高;

研究假设三: 日本挑衅行为的强度呈倒 U 型, 到临界值后将逐渐下降。

本文通过量化数据, 对比分析 2001 年以来中日经济实力变化趋势和两国关系曲线, 以图理解实力对比在中日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见图 1), 同时探求中日实力对比变化特别是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笔者发现, 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乃至逆转, 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和对抗中, 正是日本主动采取改变现状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 中日关系持续恶化。这些发现论证了研究假

① Leonardo Berkowitz, "Frustration - 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06, No. 1, 1989, pp. 59 - 73.

② Leonard Berkowitz and Anthony LePage, "Weapons as Aggression - eliciting Stimuli,"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 No. 2, 1967, pp. 202 - 207.

③ R. A. Baron and P. A. Bell, "Aggression and heat: The Influence of Ambient Temperature, Negative Affect, and a Cooling Drink on Physical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No. 3, 1976, pp. 245 - 255.

设一和研究假设二，即实力对比的变化与日本对中国的挑战之间存在相关性，且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日本政府挑起的冲突在对抗程度与频率方面就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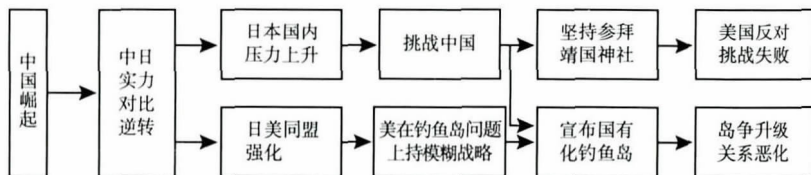


图1 中日关系互动机制

笔者还对2001年以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赋值分析，详细展示了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下搁置争议政策的效用变化过程，同时引入比较直接的战略互动分析，力图通过量化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中方的保持现状政策为何逐渐失去效用。在钓鱼岛案例的分析中，笔者拟结合研究假设三，展望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学理基础。

三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与两国关系走势

在选择中日实力对比指标方面，本文认为经济实力对比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两国综合实力格局的发展变化过程，而GDP对比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主要内容之一。^①或许有观点会反驳说两国关系的变化与中日实力对比并没有实质联系，因为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其主

^① 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间实力对比都适用经济实力对比来表征，笔者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理念，即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对比除了经济实力外，还需要考虑土地、人口和军事实力等。例如在中国经济超越韩国之前，中国综合实力就大于韩国，两国实力对比不在同一个等级，因此经济超越没有引发中韩矛盾。由于日本作为战败国家，在二战后受到和平宪法的约束，因此本文不对中日军事实力对比做特别论述，土地和人口等方面在本文分析时间范围内无明显变化，本文默认为常量。

要论据在于中国 GDP 虽然总体量大, 但人均 GDP 远远落后于日本,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实力对比与人均 GDP 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因为新加坡和瑞士等国并不能因为人均 GDP 高就获得强国或大国地位, 而印度和巴西等国家虽然人均 GDP 较低, 但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区域性强国的地位,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对比从来都是国家总体实力的对比, 而不是人均 GDP 或人均实力的对比。

在考察中日两国经济实力时,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中日 GDP 数据, 计算 2001—2011 年 (2012 年数据尚未发布) 中国 GDP 占日本 GDP 的百分比 (除非特别说明, 下文简称 P 值或 P), 以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日本经济变化对两国经济实力比较的影响, 从而得出图 2。为更好地反映中国 GDP 与日本 GDP 对比变化的速度, 本文根据图 1 计算了每年 P 值相对于前一年 P 值的增加幅度, 以此考察中国 GDP 缩小与日本 GDP 差距的速度, 从而得出图 3。^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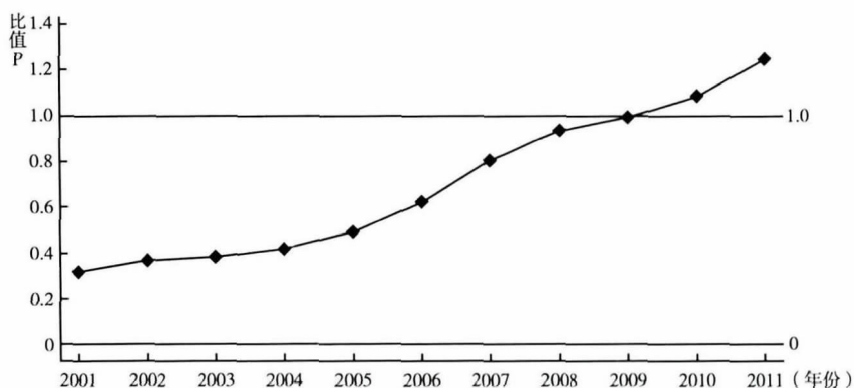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 GDP 占日本 GDP 的比重 (2001—2011)

^① 由于中国 GDP 在 2010 年之后正式超越日本, 因此如图 2 中 $P=1.0$ 处实线所示, 2010 年之后, 中国 GDP 是在拉大与日本 GDP 的优势。与缩小实力差距的作用不同, 本文结论部分将对中国拉大与日本实力差距的作用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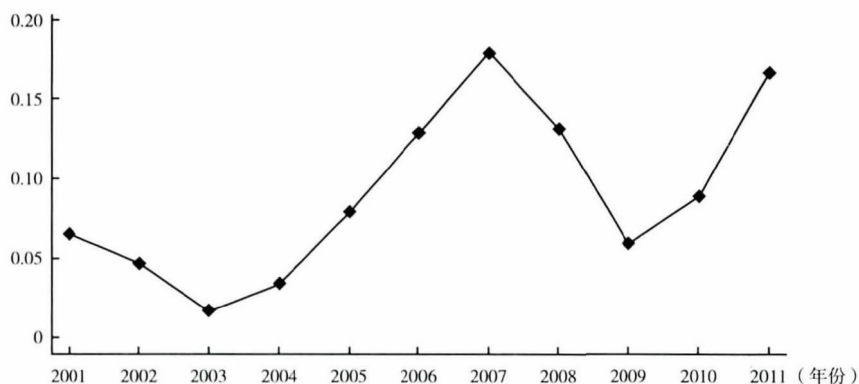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GDP缩小与日本GDP差距的速度（2001—2011）

在考察两国关系走势时，本文主要参考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大国关系定量衡量数据，图4反映了2001—201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走势，通过双边关系的量化数据我们可以考察两国关系在不同水平上的变化敏感性。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义，本文采纳项目组提供的定义，根据双边关系值，将双边关系分为六类：对抗、紧张、不和、普通、良好和友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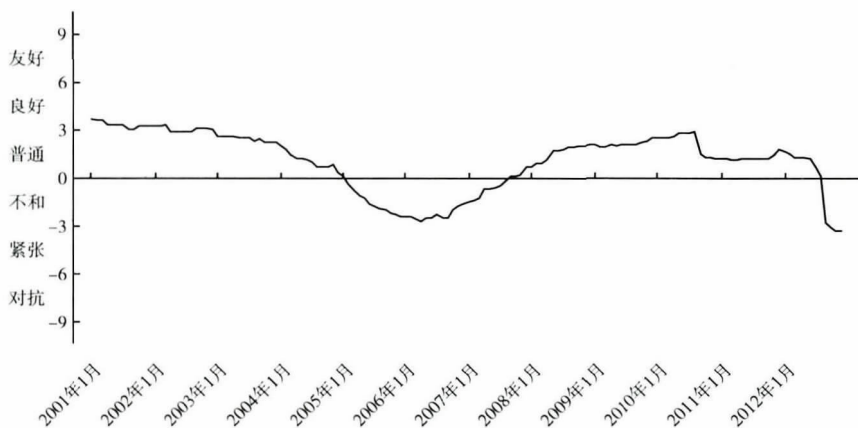


图4 中日关系走势（2001—2012）

^① 阎学通、周方银 《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4页。

通过图 2 中国 GDP 占日本 GDP 的比重、图 3 中国 GDP 缩小与日本 GDP 差距的速度以及图 4 中日关系走势,^① 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中日实力对比下的两国关系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 双边冲突的严重程度越大。^② 根据上述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与双边关系变化趋势, 结合中日关系的基本事实,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基本事实有:

1. 2000 年开始, 中国 GDP 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加快了对日本 GDP 的追赶脚步, 2000 年和 2002 年, P 值接连越过 $1/4$ 和 $1/3$ 关口。在两国关系方面, 由于日本首相小泉上台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中日关系出现动荡。需要注意的是, 在双边关系动荡的大背景下, 由于 2002 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 一些双边活动特别是高层互动,^③ 对双边关系分值起到一定的拉升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 2002 年前后中国 GDP 追赶日本 GDP 速度也稍有放缓, 不过在随后的 2003—2007 年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2. 2003—2007 年, P 值接连越过 $1/2$ 和 $4/5$ 关口。根据图 3, 2003—2007 年中国 GDP 追赶日本 GDP 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图 3 上表现出一条陡

① 双边关系变化的分值范围为 -9 到 9, 其中, -9 代表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情形, 9 代表两国关系最友好的情形, 这是两种极限情况。两者的中值为 0, 它表示两国关系处于绝对的非敌非友状态, 两个毫无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视为这种状态 (如柬埔寨与布基纳法索的关系), 或是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是绝对地各占 50% 的情况。双边关系在极端敌对或友好的状态下受事件影响的敏感性弱, 在绝对非敌非友状态下受事件影响的敏感性强。参见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 第 94 页。

② 从历史来看, 中日邦交正常化直至 1996 年以前, $P < 1/5$, 一段时间以内 P 值在 $1/10$ 左右, 中日差距巨大, 双边关系处于稳定状态, 并于 90 年代初期进入二战后最好时期。1996—1998 年, 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有所加快, 两国关系起伏较大。1996 年 9 月, 东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登岛并建灯塔, 严重挑衅中国主权, 当时的中国也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一直到 1996 年 11 月日本大选和领导人更迭之后, 中日关系才逐渐有所恢复。

进入 21 世纪, 中国经济发展加速, 中日差距开始实质性缩小, 分歧和矛盾出现, 双边关系出现震荡向下状态, 此时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对中日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可以观察到几个比较关键的 P 值是 $1/3$ 、 $1/2$ 和 $4/5$, 基本规律是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 双边冲突的严重程度越深。

$P > 1$ 时, 两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 两国出现严重冲突, 且冲突处于进一步升级状态, 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度进入“紧张”状态。根据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大国关系预测项目组的预测, 2012 年 11 月的中日关系分值为 -3.3, 已经越过由“不和”进入“紧张”状态的临界值。

③ 2002 年 4 月, 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天皇和参众两院议长、首相、各主要政党党首等; 9 月 22 日, 江泽民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讲话。

峭的上升直线，追赶势头十分强劲，中日差距迅速缩小。与此相对应的是中日双边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冲突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超过以往水平，由于小泉政府在历史问题和教科书事件等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导致中日关系摩擦增多，双边关系开始进入下降轨道。尤其是教科书问题，在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活动下，日本某些出版社动员教科书作者删除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① 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一再挑起事端，双边关系一路走低。与 P 值连续超过 1/2 和 4/5 两大关口相呼应的是，2005 年 2 月双边关系正式跌破正负值的临界点，由“普通”走入“不和”，2006 年 4 月中日关系分值一度跌至 -2.7，进入“不和”区域下端，创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的最低水平。此后从小泉纯一郎 2006 年 9 月 26 日卸任至 2007 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状态，当时成为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最差的一段时期。

3. 2008 年至 2010 年之前， $4/5 \leq P < 1$ 。此时中国在一波强劲的经济发展之后，追赶日本 GDP 的速度在这段时间稍有放缓，中日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小泉任期的动荡之后也再度出现缓和迹象，两国关系分值出现回升势头。

4. 2010 年之后， $P > 1$ ，双方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此时双方的实力关系转为中国 GDP 拉开与日本 GDP 的差距，不断积累实力对比优势。此时我们根据两国关系曲线可以观察到两国关系短暂复苏的势头戛然而止，在 2010 年詹其雄事件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詹其雄事件平息之后，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炒作购岛问题，日本政府提出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方案，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两国关系再度走低。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购岛方案，双边关系跌入谷底，当月双边关系值达到 -2.8，低于小泉时代的最低值，成为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新低点，并保持下降态势，双边关系持续恶化，进入“紧张”状态。

通过以上总结，本文展示了中日实力对比与双边关系之间的关系。通

^①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6/content_2791899.htm（访问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过比较不同阶段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中日差距缩小速度与中日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经济优势明显，但在中国快速崛起下，中国缩小与日本差距的势头十分迅猛。1991 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为日本的 1/10，2010 年中国实现对日本的超越，前后时间不到 20 年。尤其是进入 2000 年以后，中国接连突破 P 为 1/4，1/3，1/2，4/5 和 1 等几大关键节点，几乎是两年一个台阶，快速完成了对日本经济的超越。这个过程也清楚地展示了挫折—攻击理论所需要的挫折量的累积过程。我们通过双边关系值观察到攻击强度的递增，即中日双边冲突严重程度不断加剧，符合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一和研究假设二，这表明实力对比的变化与中日关系之间存在相关性，且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中日关系的分值就越低。

在表 1 中，笔者应用 SPSS 16.0 软件计算了两者间的相关系数，时间为 200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其中，中日关系是月度数据，例如在 2001 年中日关系在 12 个月具有 12 个分值，而中日实力变化速度则是年度数据，只能根据每年 GDP 算出某年的追赶速度。为了计算的方便，笔者假定在某一年中追赶速度是相同的。例如，2001 年的追赶速度为 0.065，则可以认为从 2001 年 1 月到 12 月每个月的速度都是 0.065。根据 SPSS 16.0 软件计算，笔者发现，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0.473，P 值（此处指统计显著性判断指标）很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 1 中日实力差距缩小速度与中日关系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P 值	数据量
中日差距缩小速度与中日关系的相关系数	-0.473	0.000	132

四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与日本战略选择

前文论述了当前国际格局下中日两国实力变化与两国关系变化的基

本关系，表明随着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中日关系随之出现动荡态势，两国关系的走向与中国经济实力赶超日本的速度存在共变趋势，即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两国发生冲突的程度与频率就会越高。为进一步论证研究假设一和研究假设二的可靠性，本部分将分析日本国内民意的变化所致的国内压力上升，从而论证实力对比引起的中日关系恶化是日本主动采取挑战现状的政策造成的，并在下一部分以钓鱼岛问题为案例进一步加以分析。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仅是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当时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是中国拥有政治大国地位的最大资本。但在经济层面，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只有日本 GDP 的 1/10 左右，人均 GDP 甚至不及日本的 1/80，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中日复交后的一段时期里，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具有的普遍心理；^① 日本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和对中国的援助也拉近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民意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出现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是 2001 年中国购买力平价 GDP 超越日本。^② 与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形势相比，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曾经强势的日本制造业呈现日暮西山之势。日本曾制定所谓的“雁型”经济策略，比喻自己为亚洲经济的雁头，其中的民族自豪感不言而喻。然而随着中日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 2010 年中国 GDP 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 40 多年的经济大国地位受到重创，日本短期内难以寻回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小泉上台后，牵制中国发展和崛起成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面对影响力节节上升的中国，小泉选择在教科书事件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发难，但当时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其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表示强烈抗议，最后连美国都不得不出来表态，敦促日

① 杨栋梁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东北亚学刊》2012 年第 4 期，第 5 页。

② 《中国 10 年前就已超越日本》，（英国 《金融时报》2011 年 2 月 17 日。报道中文版本见《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983/ce>（访问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本重视历史事实，反思战争历史，那时日本掀起的挑战可以说是无果而终。

第二个关键节点则是 2010 年中国 GDP 正式超越日本。同时，中国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大，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可谓光彩夺目，反观作为邻国的日本，在“普通国家”及“入常”等政治诉求上接连遭遇挫折。当这种反差与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很容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助推器，进而对两国民众的相互情感产生负面影响。^① 有关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 1980 年达到 78.6%，为最高点，1991 年降至 51.1%，此后一路下滑。从 2005 年至 2012 年 6 月之间的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的变化曲线上可以发现，截止 2012 年 6 月，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变成无亲近感的比例为 84.5%；中国亦展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见图 5）。^② 随着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下降，近 20 年来支撑中日合作关系的民众基础正日益变得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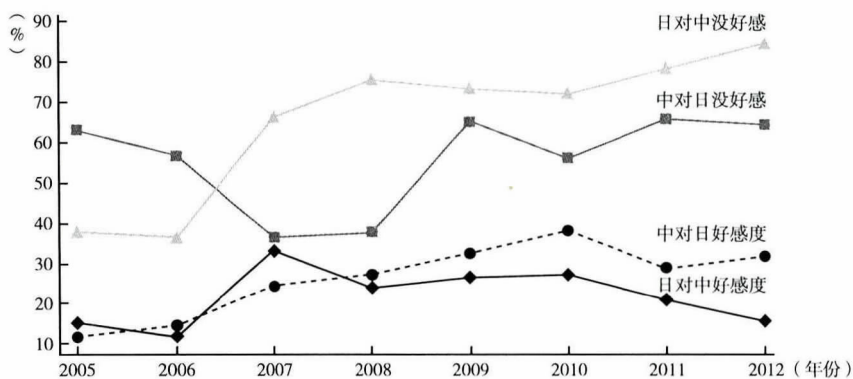


图 5 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的变化

① 杨栋梁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第 5 页。

② 相关调查和数据分析，请参见《2012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中国日报网，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06/19/content_15512904.htm；《第 8 次日中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日] 言论 NPO 网，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www.genron-npo.net/pdf/forum2012.pdf>。转引自杨栋梁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第 3—6 页。

中日关系的这种变化也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例如当某同学缩小与第一名的考试成绩差距时，后者对追赶者的敌意小于被超过时，因为缩小时，领先者仍保持着荣誉，而被超过后荣誉就没了。即只要保持是第一名，别人的成绩缩小，第一名学生有的也只是担心；而如果第一名被赶超者超过，成为第二名，这时第一名的心理就是忌恨，而不是担心。日本一直是亚洲的经济老大，2001 年中国购买力平价 GDP 超越日本只是使后者担心，而 2010 年中国 GDP 的正式超越则使日本忌恨，其中反映出的就是挫折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此时日本选择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有其必然性。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不是此时的野田政府，不是此时的钓鱼岛，也会出现另一个日本政府，另一个争议事件。日本要挑起争端，塑造自身敢于挑战中国的国际国内形象，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宣示日本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同时国内的右倾化现象也日益加重，国民希望日本能够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在战略层面上则认为中国将对日构成威胁，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加快了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本开始以日美同盟为依托，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民间和政界希望日本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日本政府在众多问题上采取挑衅政策的行为正是顺应了日本国内情况的这种转变，这表明日本政府的战略冲动是其主动选择。从首倡“自由与繁荣之弧”到推进“价值观联盟”，从制定新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军事力量南移到积极与韩国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最后一小时遭韩国拒签），从承诺向菲律宾赠送 12 艘巡逻舰艇到承诺帮助越南培训海岸警备人员等，日本为在中国周围拉帮结伙、制造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而动作频频、不遗余力。^①从国际环境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遏制和打压中国的考虑，需要日本这样的急先锋。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模糊战略明显偏向日本。日本政府公开加强对钓鱼岛主权宣示，全面否

① 蒋立峰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2 年第 5 期，第 33 页。

定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海上保安厅对所有进入钓鱼岛海域捕鱼的中国、中国台湾渔船采用高压水枪喷射等手段予以暴力驱逐。日本在中日关系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和挑衅立场使得中日关系面临巨大挑战。

日本右翼势力向来钟爱炒作钓鱼岛问题，2012 年以来的钓鱼岛冲突更是在石原提出“购岛”闹剧之后愈演愈烈。结果日本政府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亲自出面“购岛”，让中国政府看到日本国内右倾的危险政治倾向，面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日益右倾化，中国政府选择强硬应对，原因很简单，“如果不予以制止，会进一步助长其气焰，使得日本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发展下去，历史悲剧重演不是没有可能，这不仅会把亚洲甚至世界拖入灾难，最终也将祸害日本自身”。^①日本朝野上下弥漫的右倾气氛，让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也因为钓鱼岛问题而跌入谷底。过去中日两国搁置争议，双方之间不强硬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做法，如今已被日本打破，日本否认中日曾经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并且不断加强在钓鱼岛上的所谓实际控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主动发起挑衅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使得中日关系面临巨大挑战，导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

五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战略选择

前文展示了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日关系随之出现的动荡态势，发现的基本规律是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两国关系发生冲突的程度与频率就会越高，笔者进而证明是日本政府主动做出挑战中国的战略选择。两国关系的这种走势和日本挑战中国的战略选择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了体现。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日结构性矛盾不仅导致两国关系的震荡向下走

^① 《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就钓鱼岛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12 年 10 月 26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982822.htm>（访问时间：2012 年 12 月 15 日）。

势，也对两国间处理分歧矛盾的具体政策的效用产生明显的影响。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政策曾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开创了中日搁置争议和中日关系发展的良好局面，然而随着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挑衅政策，搁置争议政策的效用也越来越低。

为进一步论证中日实力对比、日本战略选择与中日关系恶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下文将以钓鱼岛问题为例，对 2001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以及由此对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并通过搁置争议的政策效用变化过程具体展示冲突对抗程度的变化过程。笔者梳理了 2001 年至 2012 年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事件表，^①整理出钓鱼岛问题分值调整和频率（见图 6）。^②

根据图 6，结合图 3 中国 GDP 缩小与日本 GDP 差距的速度，根据前文对不同阶段的中日关系特点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的基本规律是：中日

① 本文主要参考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定量数据库和《事件分值基准表》，为方便分析，笔者对《事件分值基准表》中的数值调整 10 倍，如对于大使（包括外交司局级）严正交涉，基准表计 -0.5 分，本文计 -5 分，频率计 1 次；外交发言“强烈不满”或批评对方政策不利于双边关系，基准表计 -0.3 分，本文计 -3 分，频率计 1 次；外交发言“非常遗憾、不能接受、反对、谴责、严重关切”，基准表计 -0.2 分，本文计 -2 分，频率计 1 次；外交发言表示“关切、遗憾”，基准表计 -0.1 分，本文计 -1 分，频率计 1 次。《事件分值基准表》参见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 731—734 页。

② 本文把中日领土争端的年度数值（文中简称 V 值或 V）相加，得出一年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事件的总分值和发生可记分值事件的总次数，根据分值高低分为冲突弱（-15，0）、冲突强（-60，-15）、严重冲突（-∞，-60）三个等级；按照年度频率次数（文中简称 F 值或 F）分为低（0，5）、中（5，15）和高（15，∞）三个等级；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分为有效时期、效用下降和无效三种情况。具体赋值对应关系如下：

当 $-15 \leq V \leq 0$ 且 $0 \leq F \leq 5$ 时，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处于低等水平，冲突的对抗程度弱，为搁置争议政策有效时期；

当 $-60 \leq V < -15$ 且 $5 < F \leq 15$ 时，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处于中等水平，冲突的对抗程度强，搁置争议政策效用下降。

当 $V < -60$ 且 $F > 15$ 时，表明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处于高等水平，冲突的对抗程度严重，搁置争议政策无效。

其中 $V = 0$ 且 $F = 0$ 表示该年度中日关于钓鱼岛没有发生争端，可记录分值为 0，即搁置争议政策完全发挥作用；V 接近 -∞ 且 F 接近 ∞，表示该年度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的程度和频率出现极值，钓鱼岛问题发生严重冲突且仍在升级，即搁置争议政策完全失效。为更平衡地展现其他年份的数值，笔者限定了图 6 中 V 值和 F 值的最大值分别为 60 和 45。截至 2012 年 11 月 31 日，V 值 233，F 值 92，双双突破图 6 数值范围，出现极端情况。

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 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程度就越高, 冲突频率也就越高, 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就越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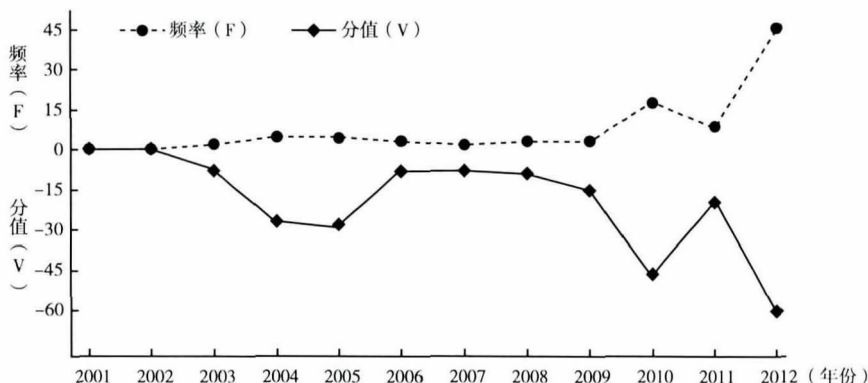


图 6 钓鱼岛事件分值调整和频率 (2001—2012)

从总体上说, 2001 年之前, 搁置争议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 日本右翼分子针对钓鱼岛的一些小动作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中日关系的走势。搁置争议政策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忍耐, 例如 1996 年 9 月, 东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登岛并建灯塔, 严重挑衅中国主权, 当时的中国也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耐心等到 1996 年 11 月日本大选和领导人更迭之后, 中日关系才逐渐有所恢复。^② 搁置争议政策发挥效用的大背景是: 当时的中国国力相对弱小, 实力对比 P 值在 $1/5$ 以下,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P 值在 $1/10$ 左右, 中日差距非常明显, 两国经

① 在中日实力差距巨大时, 例如 $P < 1/5$ 时, 即日本 GDP 是中国 GDP 的五倍或五倍以上时, 中日差距巨大, 双方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分歧和矛盾在可控范围内, 搁置争议的政策效用明显; 在中日实力差距达到一定比例时, 例如 $P < 1/4$, 即日本 GDP 不到中国 GDP 的四倍时, 中日差距开始缩小, 双方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矛盾加多、加深, 搁置争议政策效用下降, 此时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对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对抗程度和频率以及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基本规律是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 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水平越高, 冲突频率越高, 搁置争议的政策效用就越低; $P > 1$ 时, 两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 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严重冲突, 且处于进一步升级状态, 搁置争议政策失效。

②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 41.

济实力不在一个水平上，无从谈起中国经济赶超日本，此时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与日本保持良好外交关系和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发展自身经济。

进入 2001 年以来，随着中日实力差距的快速缩小，中日关系也随之动荡起伏，双方关系值进入下降通道，根据笔者整理的 2001—2012 年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事件表，可以发现以下事实现象：

1. 2001—2010 年，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的对抗程度和频率越大，反映出的中方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就越低。

在 2001 年前后，中国 GDP 的追赶速度有所增加。2000 年和 2002 年，P 值接连越过 $1/4$ 和 $1/3$ 关口，两国间发生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靖国神社问题。不过中日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也存在程度和频率升级的现象，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和在钓鱼岛设置灯塔等行为招致中国的严重抗议和不满。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通过钓鱼岛冲突的程度和频率我们可以发现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开始降低。

2003—2007 年，P 值接连越过 $1/2$ 和 $4/5$ 关口。从图 3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2003—2007 年中国 GDP 追赶日本 GDP 的速度明显加快，在图 3 中表现为一条陡峭的上升直线，追赶势头十分强劲，中日差距迅速缩小。在这段时期，对中日关系更具破坏性的是小泉政府选择在历史问题和教科书事件等问题上挑起事端，导致中日双边关系一路走低，一度创下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水平。虽然此时钓鱼岛问题不是矛盾的焦点，但相比较之前的水平，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出现冲突严重程度上升的情况。从图 6 可以看出，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的次数虽没有明显增加，但对抗程度较前期明显上升，由此反映出搁置争议政策效用在继续下降。

在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加强主权宣示的立场也日益强化和明显，右翼政治团体在钓鱼岛上所建灯塔由日本政府接手管理，在钓鱼岛问题上加强主权宣示得到日本朝野的支持，日本防卫厅甚至制定了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有事”应对方针，招致中方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对于中国大陆和港台保钓人士，日本政府的应对日益强

烈,甚至非法扣留中国保钓人士,引发中国方面的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国内也出现反日游行和示威。此时,搁置争议政策受到日方政策的严峻挑战,钓鱼岛冲突的程度和频率反映出搁置争议政策效用下降幅度超过之前水平。

2008—2010 年之前, $4/5 \leq P < 1$ 。此时中国在一波强劲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追赶日本 GDP 的速度在这段时间稍有放缓,中日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小泉任期的动荡之后也再度出现缓和迹象,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稍有缓和。

2. 2010 年之后, $P > 1$, 双方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此时中日 GDP 对比表现为中国开始拉开与日本的差距,不断积累实力优势,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为出现严重冲突,搁置争议政策无效。

2010 年中日 GDP 对比出现逆转, P 值正式超过 1, 此时两国 GDP 对比关系表现为中国 GDP 拉开与日本的差距,不断积累实力优势。钓鱼岛问题上的缓和态势未能持续,中日关系曲线在 2010 年詹其雄事件之后直线下滑。事件平息之后,中日关系复苏的态势并没有维持,在右翼分子关于购岛问题的炒作之下,日本政府公开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曾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与共识,并推出所谓“国有化钓鱼岛”政策。如果说之前日本右翼分子的各种小动作是宣示主权,那么 2010 年之后日本的举动是以实际的政府行动宣告钓鱼岛问题不存在主权争议,例如通过詹其雄事件表示它是在依照国内法行使主权。2012 年购岛举动更是直接否认中国主权,意图造成既成事实,这也触及中国主权问题上的底线。日本直接并彻底否定了“搁置争议”政策,使得搁置争议政策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中失去效用。

从图 6 可以看出,中日 GDP 对比形势从中国缩小差距转变为拉开差距后,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的次数和对抗程度急剧上升。2010 年围绕詹其雄事件两国争议次数和程度达到新高点。2012 年,针对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的次数和对抗程度呈直线上升态势,无论是冲突的程度还是频率都飙升,且双双呈现“爆表”

趋势。日本的国有化政策招致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制，中国的海监船开始在钓鱼岛区域定期巡航，中国海监飞机赴钓鱼岛领空巡航，中国外交部已就日本出动军机侵犯钓鱼岛中国领空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据悉，这是1958年来中国飞机首入钓鱼岛领空。^①此时，中日双边关系进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新低，两国关系由“不和”进入“紧张”态势。

上文进一步展示了中日实力对比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阶段中方搁置争议政策效用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经济快速缩小与日本差距乃至最终反超的过程中，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挑衅政策，日本发出挑衅政策的攻击强度和频率与双方实力对比之间存在共变趋势，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一和研究假设二。

与日本主动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政策不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则是始终如一的，是顾全中日关系长远发展大局的。早在中日建交时，针对钓鱼岛归属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一政策表明了中国主张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立场。^②提出搁置争议政策的大背景是：当时的中国国力相对较弱，与日本建交并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发展自身经济。从政策选择本身来讲，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以大局为重。钓鱼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放弃主权要求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事关政权的合法性，为着中日关系的大局暂时搁置争议，有助于中日建交和双边关系的发展；二是面对主权争议，适当地规避冲突，缓和双方矛盾，避免争议升级和扩大化，从而减少

①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军机侵犯中国领空答记者问》，2012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t998332.htm> 《日本称1958年来中国飞机首入“日本领空”》，http://japan.xinhuanet.com/jpnews/2012-12/14/c_132040067.htm?prolongation=2（访问时间：2012年12月15日）。

②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详情参见外交部有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介绍，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t8958.shtml（访问时间：2012年12月15日）。

发展中日关系的阻力。

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搁置争议政策符合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问题,中国向来主张通过谈判对话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从总体上说,搁置争议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搁置争议政策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政府的维持现状政策,面对日本采取的一些小挑衅动作,中方展现了最大程度的忍耐。应该指出的是,搁置争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在于为发展中日关系创造有利环境,并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搁置争议本身并不是放弃主权,而是主张主权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和平的、“以退为进”的战略。它是基于当时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如果一味追求领土主权问题不放松,执行主权利益最大化政策,反而会葬送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正常化大局。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搁置争议政策无疑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对于中日关系大局来说,钓鱼岛问题是小局,中方因此提议将钓鱼岛问题搁置,留待后人解决;从国际层面上看,这对于中国突破苏联影响、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大局来说,也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①

但是大局所包含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大局与所谓“小局”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国际环境和两国外交态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今天,中日关系的大局是“战略互惠”,相对来说钓鱼岛问题仍属小局,但已不是长久搁置无碍的小局,而成为应认真解决的小局,现在的日本就是从根本上否认钓鱼岛主权归属,购岛举动将在事实上损害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这种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的措施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决好钓鱼岛问题,就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类似这次钓鱼

① 当时为了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中美关系缓和,中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峰期(第一次建交高峰是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建交),其中主要是与西方国家建交。详情参见外交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2193/> (访问时间:2012年12月15日)。

② 蒋立峰《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32—48页。

岛问题，如果中方对日方的挑衅抱息事宁人的态度，致使日方的企图得逞，则中日关系可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应对野田政府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时，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强硬政策。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能够同多数国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顺利解决边界问题，但同印度、苏联和越南曾一度兵戎相见。可见在解决与陆地邻国边界问题上，中国有宽和与强硬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有研究发现，邻国的边界政策属性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即如果邻国奉行扩张性边界政策，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反之，如果邻国奉行维持现状的边界政策，则中国的政策选择倾向于宽和。^① 这种选择有利于维护边境的长治久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根据本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设，笔者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日本全面否认钓鱼岛问题存在主权争议的情况下，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政策已经无效，中国被迫改变既有政策，对日本的挑衅行为给予回应和反制。当中国的反制措施达到一定的强度，使得日本无法继续承担挑衅行为的后果时，其挑衅行为的攻击性反而会降低。也就是说，日本挑衅行为的强度将成倒 U 型，到达临界值后将逐渐下降。

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学中的损失规避概念进一步解释日本挑衅行为的这种变化过程。损失规避是理性行为体面对实际或可能损失时的一种较普遍的心理反应，其影响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② 在风险规避中，风险的度量标准就是潜在损失的大小，效用理论认为行为决策中的决

① 聂宏毅、李彬 《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4 期，第 1—34 页。

② 1979 年，Kahneman 和 Tversky 通过实验发现，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并不相同，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他们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损失规避的程度与赌博游戏中损失绝对值的大小成正比，而且随着赌博游戏中获益损失绝对值的增大，损失规避也就越强烈。参见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pp. 263 – 292. 转引自刘欢等《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规避》，《心理科学进展》2009 年第 4 期，第 788—794 页。

定因素是客观结果导致的主观心理效用。^① 日本的挑衅与中国的反应是一个互动过程,当日本因为挫折量的积累而增加挑衅强度时,中国针对日本挑衅的反制措施达到一定的强度,例如当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底线时,中国的反制措施也日益升级,并通过具体政策行为发出强烈的警告信号,使得日本对风险的预期发生改变。

当然,如何定义此处的临界值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临界值最有可能出现在两个时间点:一是冲突升级到军事冲突发生前的临界点,挑衅方选择退缩;二是冲突失控导致小规模军事冲突,挑衅方失败后降低挑衅力度乃至退却。在笔者看来,能对日本挑衅行为构成有效约束的外部因素除了中国的回应和反制措施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依笔者浅见,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需要日本这样的盟友在东亚牵制和防范中国,但如果日本在中日双边问题上一味挑衅和强硬,如当前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拒不承认钓鱼岛主权之争的立场,并力图强化美日同盟以牵制中国,可能导致中日之间发生战事,这势必会把美国卷入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会适当地对日本施加压力,防止当事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的临界值更有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即中日钓鱼岛问题失控导致军事冲突发生前的临界值,随着中方反制措施和美国约束日本的强度到达一定程度,中日关系将迎来临界点,迫使日本逐渐降低挑衅行为的强度,双边关系将面临一个剧烈震荡的缓慢复苏时期。

六 结论

通过中日两国 GDP 比值的变化曲线、中国 GDP 缩小与日本 GDP 差距的速度曲线和中日关系变化曲线,本文展示了 2001 年以来两国实力变化与两国关系变化的基本关系,发现实力对比的变化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基

① 刘欢等 《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规避》,第 792 页。

础性的作用，中日实力对比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走势。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经济优势明显，但在中国快速崛起下，中国缩小与日本差距的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进入 2000 年以后，接连完成 P 值为 $1/4$ ， $1/3$ ， $1/2$ ， $4/5$ 和 1 等几大关键节点的超越，快速完成了对日本经济的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双边关系也经历了冲突严重程度和频率的上升过程。

通过对比分析 2001 年以来中日经济实力变化趋势和两国关系曲线，我们可以论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一和研究假设二，即正是日本主动采取改变现状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导致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日本政府挑起的冲突在对抗程度与频率方面就越高。

2010 年中日 GDP 超越日本，并不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中日 GDP 对比形势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与缩小实力差距的作用不同，中国拉大与日本的实力差距的作用可能不同。在中国不断缩小与日本差距的过程中，两国关系随着中国不断加速缩小实力差距而不断恶化；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拉大与日本的实力差距，并且有加速的可能，根据实力对比与双边关系走势的基本逻辑，可以推测，在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实力差距越大，中日关系会越改善。此推论的基础在于随着中国对日本的实力优势越来越大，日本意识到无力与中国抗衡后，会着手调整对华政策，转变对抗政策，两国关系将出现改善的契机。

当然以上推论和关于日本在当前钓鱼岛冲突上的挑衅强度将呈倒 U 型的分析将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在中日两国日益升级的矛盾冲突中，无论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的强度和意愿是否足够强大以及能否及时和奏效，对于中国来说在面对日本日益升级的挑衅行为时采取强势回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中国的回应措施强势而不强硬，有理有据，有助于促使日本放弃幻想，有助于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检验规律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备重复性，按照本文推理和论证的逻辑过程，关于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势，如果实力对比与两国关系的共变趋势继续存在的话，

笔者大胆预测,在中日实力对比逆转并且中国继续扩大对日本的实力优势的前提下,当中国 GDP 达到三倍于日本 GDP 的程度时,^①即双方实力差距很大时,日本意识到无力与中国竞争将会调整对华政策,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得到的另一个启发是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日实力对比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变化将决定今后十年中日两国的外交日程,我们需要正视这个事实,也应当认识到在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它们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事件应对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只有对以上情况有充分认识,才能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变化对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下大国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必然对现有体系的权力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霸主国不会漠视自身权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下降,会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新兴大国的权力上升,两者的冲突和对抗在所难免。中国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不能一味退让,否则将失去外交政策的主动性。中国只有改变观念,认识到有所作为与和平崛起是并行不悖的,坚持在国际舞台上执行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才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中国应秉持足够的战略自信,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不能以损害重要国家利益为前提,不主动挑事,事来了也不怕,敢于针锋相对,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① 据笔者粗略估算,如果以 2011 年中日 GDP 比值 1.25 为初始值,假设中国 GDP 增速保持 8%、日本 GDP 保持增速为 2%,经过约 15 年左右的发展,中国 GDP 规模将三倍于日本。考虑到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和日元贬值态势,这一时间点有可能提前,因此笔者倾向于将这一时间点预测在 2025 年。根据外界一些预测,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 2020 年超过美国。在本文预测的时间点 2025 年,亦即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并继续稳定发展 5 年左右,日本可能调整对华政策,选择追随强者策略。

作者简介

王 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10210170049@fudan.edu.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Routledge, 2011)、《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 防御性现实主义》(Palgrave Macmillan, 2010) 等。

电子信箱: twukong@gmail.com

郭 扬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著有《军队创新体系》(合著, 2002 年), 译著有《军事力量对比》(合译, 2002 年)。

电子信箱: gygfdx@sina.com

谢 超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2008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2004 年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xiechaocn@gmail.com

李少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09110170017@fudan.edu.cn

黄智虎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商务部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处长。

电子信箱: 15011039927@139.com